

90后调查:不甘于平庸期待剧变

核心提示

“别老拿我和别人比较,不是我喜欢标新立异,我只是对一成不变不敢苟同。你们为我安排的路,总是让我迷路……”90后这个群体的复杂性引来诸多争议,90后有着他们的宣言。社会的宽容度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土壤,毕竟这是这个时代都可以做的时代。

如今,90后已经粉墨登场,透过简单的标签去深入他们,这是我们面对未来社会变革应该做的一次尝试。毕竟他们是改变的一代。

世界终归是他们的

90年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年代,尤其在中国,各种从未想象过的事物竞相涌现。在这个十年的伊始,上海浦东有了证券交易所,深圳罗湖有了麦当劳,人们穿行的步伐越来越显得紧凑。

出生在此后的婴儿们,无疑活在变化的时代中。90后没有关于过去几十年改革和变动的痛苦记忆,却经历着这个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和全球化。

等90后的婴儿懂事,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物质的丰盛。互联网在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和表达方式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成长历程。纽约的少年和北京的学生通过互联网发现他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然后他们通过各种符号交流着,毫无障碍。地球变小已经不能让我们惊讶不已,在当今世界,我们对日新月异的突破已经习以为常,只有90后一直在让长辈们瞠目

结舌——伪娘、PS自拍照、火星文、脑残……网络上流行的新词一次次被90后刷新。

除了诸多带有负面色彩的形容词之外,他们自信、独立、有主见,忠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对自己的未来更有规划。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出生于1990年后的人口为2.64亿,而当中,在校生约有1亿。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逐步迈入18岁成人的行列,他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进入社会,甚至已经有小成绩。如同他们的前辈,90后在他们的青春期急于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期望以群体亮相的方式宣告他们已经长大。

更“懂事”的90后父母

2009年,张育航的儿子张达星上初二,他在自己的QQ空间博客上转贴了自己欣赏的几句话: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青春就像卫生纸,看着挺多的,用着用着就不够了。

张育航虽然不解儿子所推崇的所谓“人生教条”,但比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也觉得儿子的确更有想法。

1988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第四代人》,可以视为一部60后的总结之书。作者认为,随着高考恢复,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市场经济观念的盛行,60后的价值观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这一点也充分折射在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观念上,是“放养”而非“圈养”。

80后成长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看到上大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因而孩童们自然承担起重任。可到了90年代,经商、出国等等社会上途径不一而足,张育航这样的父母,自然更“懂事”——懂得尊重儿女的价值观,懂得“放养”在孩子自由天性发展中的重要性。

“活”在网上的一代

在网上搜索“90后”,搜索引擎提示“是不是要搜索90后贱女孩?”包包和阿紫,两个出生于1990年的孪生姐妹,言辞大胆,自称“90后贱女孩”,在博客上,一个月的点击量就有1900万。

包包、阿紫是典型的90后网络红人:通过出位言行在网络蹿红,以网络为平台聚集一群粉丝,然后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宣传包装,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比起前辈们,90后在使用网络上有天然的优势。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未来使用电脑将是一门基本的生存技能,只是恐怕谁也没有想到,网络在90后的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如今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快乐的来源。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90后”在不同生活场所中的快乐感变化趋势不同。总体来看,学校快乐感随年级升高逐渐下降,上网快乐感随年级升高整体逐渐上升。如此看来,虚拟生活大

有取代现实生活的趋势。

一名典型的90后网络少年的房间几乎没有白天黑夜的差别。任何时候光临,必有一台电脑在窗帘微开的幽暗室内闪烁。下载视频、MP3,玩游戏,泡论坛,查资料,跟国内和国外的朋友聊天。他去过的地方不多,却拥有各地的朋友。“我们交朋友也不大看别人来自哪里,兴趣相投就会加好友聊天。”他们已经习惯了网络的节奏,习惯了点开一个又一个链接,由此缔造了一种松散的、琐碎的、快速的生活节奏。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漫画、动画以及影视作品是他们的最爱,但说起大幅阅读文字,一定让他们头疼不已。买东西能上淘宝货比三家,如果卖家没有及时回应,却很容易把这个卖家拉入黑名单。

这种快节奏松散的网络化生存模式或将影响他们成年以后的思考方式,充满创意,却缺乏凝练和耐心。

19岁的大学生王中宇早已习惯于每日抱着电脑穿行于课堂和校园之中,他完全肯定网络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社会认为我们希望与众不同,个性十足,希望像个坏孩子一样却充满创造力。这不就是网络的特质吗?”他还说:“我们确实不想那么平庸,不喜欢老一套的习俗,尤其在中国,我们认为更需要剧烈的改变。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虽然像火星文、脑残等出现在网络上的90后发明备受争议,但我更希望成年人看到的是我们的活力和创造力。”

反叛的坏孩子?

在名为“中国安静”的博客上曾贴出一篇文章,叫做《90后坏行为系列》,是由一个青少年展示的关于性的内容,其大胆程度令人震惊。博客里还说道:90后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疯癫,行为不当,神经,并且过早发生性行为。

在父母师长看来,90后的早熟是一个潜伏的危险信号。许多90后少年的QQ签名往往是一些极其伤感的话,例如那句著名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长辈看到了难免担忧孩子被早恋困扰,但这些少年依然是该念书念书,该玩玩玩玩,伤春悲秋伪装成一种时髦,继而成为同龄人之间的谈资。

除了依然被当成孩子,在90后身上恐怕多了一个“坏”的标签。这是时代所特有的评价,正如70后的叛逆,80后的娇气。脑残、非主流、校园暴力、炫富,再用“垮掉的一代”形容90后似乎已不合时宜,他们“比垮更垮”。

“把父母20岁以后干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除了不挣钱。”“喜欢在网络上秀自己,包括炫的方面。”“拜金,追求物质享受。”“道德底线



90后女生充满自信 (资料图片)

越来越低。”在“你如何看待90后”的一个网络调查中,逾半数网友对90后给出了上述负面的“评价”。“90后刚刚兴起,就抨击90后,这样是不对的。”被媒体报道多了,包包和阿紫说:“正如一个同龄人说的,希望社会给我们灭火器,而不是助燃器。”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否定他们的表现。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他们的反叛是生活上的反叛,小节的反叛,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更中性化,生活方式更模糊,道德界限也越来越不清晰。”

杨雄认为90后的特质“谈不上坏”,“由于父母给他们的东西满足度比较高,他们没有理由反叛,他们不需要反叛就可以获得很多。”但这不代表90后唯命是从。

18岁的少女导演艾水水,拍过三部电影,她还要把自己的电影再一次送到国际影展;1990年出生的小浩现在深圳当模特,但她深知这是青春饭,业余学习英语,兼职培训师;小纯,16岁的新疆女孩,号称淘宝年纪最小的网店掌柜,现在是韩国一家彩色隐形眼镜的代理商,“我以后想当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如果考上就自己做生意。”在小纯看来,读书只不过是方便了将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90后对自己的人生早有规划,社会现实让他们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工具的人,更加务实的人。

“他们更像是在过游戏中的人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社

会的宽容度以及将来高考制度的改革,肯定要打破应试教育体制,这将为90后的成功和多样化选择提供土壤,这是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

改变的一代

给任何一个群体贴上标签试图以此去了解他们,都是简单化且不可能的,尤其是90后,我们只能“小心翼翼”选取几个他们明显的特色,姑且称之为“标签”。年轻是最正确不过的事情,他们可以像任何一代年轻人曾经那样的叛逆、勇敢、自信、无所畏惧,以及相信一切美好;但他们又比以往任何一代更有创造力、更快速、更特立独行。

当新鲜变成陈腐,那它剩下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被打破。在更宽容的社会和更繁杂的信息里,90后用他们的形象、观点和生活方式告诉这个世界:创新者来了。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认为自己将是变革的一代。但总是会有某些特定年代的人更富有变革的心态,他们的行为观念对这个社会带来的改变更大。从90后的成长环境来看,他们接受的事物更为广阔,接受的价值观念更为多元。他们对家长不再言听计从,他们对上级不再亦步亦趋。

这些类似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若是被带到经济和政治领域,有些变化将会自然而然,且将是巨大的。再用“迷惘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形容90后似乎已不合时宜,他们普遍被期待为“the generation of change”,改变的一代。 据《南都周刊》



90后自拍艺术照 (资料图片)

交通事故已成第一“杀手”

说出来吓人一跳:交通事故已成第一“杀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比因其他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上半年,因各类事故死亡33876人,其中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达27270人。据此解读,全国每天死于交通事故的约有150人。也许是因为媒体往往聚焦于煤矿爆炸、水灾天灾等安全事故,倒是和老百姓关系更密切的交通事故,似乎被大大地忽视了。

有些数据值得进一步解读。比如,上半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多的是:广东2960人、浙江2214人、江苏1911人。这三个省都是经济大省。看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车多,出行多,事故也就比较多。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三省在全年控制指标上,表现尚可。说明虽然事故多,但抓交通安全还是有成绩。由此,是不是可以得出两条认识:一、不能GDP增高了,交通事故也跟着增长,必须找到更好的对策。至少,不要同步增长。二、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绝对数虽然较少,但事故率并不低,交通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车辆激增带来的问题,往往被驾车的便利和舒适所掩盖。尽管交通事故已成为第一“杀手”,但买车驾车的热度依然不减,甚至对公路这个高危环境浑然不觉。想想看,这些年我们亲眼所见的交通事故究竟有多少,而我们自己面临的极度险情和致人受伤的情况又有多少?中国终将成为汽车大国,更多的家庭将拥有自己的汽车,这个进程会不断加快。问题是,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公民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要限制时速?为什么要严查酒驾?为什么不能疲劳驾驶?为什么必须系好安全带?为什么要实行严格的年检?这些,在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很多教训告诉我们,有些规矩哪怕违反一点点,都可能酿成必然的悲剧。

车多了,人流物流频繁了,并不能成为交通事故难以避免的理由。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人均拥有汽车量远高于我们,但伤亡事故照样可以控制得较低,甚至逐年降低。这里面,公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应是主导方面。个人的生命安全很重要,一旦事故发生亦必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既是对个人负责,更是对他人生命权利的尊重。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想,这样做,事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我们常常震惊于煤矿透水爆炸使鲜活的生命陨落,但我们又常常忽视公路这个“杀手”,离每个人都很近。或许应该一次次地疾呼: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危,请维护交通秩序,遵守交通规则。 赫赤

赵小亭的爱心不该换来寒心

这两天,许多人在谈论一个名叫赵小亭的女大学生。赵小亭是武汉大学2008级本科学子,年仅21岁。她在偏远的贵州贵定县马场河小学支教期间,不幸被山石砸中,把生命留在了她为之眷恋的大山里。

赵小亭去世后,众多网友自发在论坛、微博中悼念她。共青团中央追授赵小亭“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共青团湖北省委、武汉大学分别追授她为“湖北省杰出大学生志愿者”和“武汉大学优秀大学生志愿者”荣誉称号。但贵定县政府对于这位支教女大学生的死却异常冷漠:在赵小亭的追悼会上,没有一个当地官员出席;赵小亭生前支教的学校,也没有一个教师出席;当地政府甚至下达封口令,要求所有知情官员不得接受记者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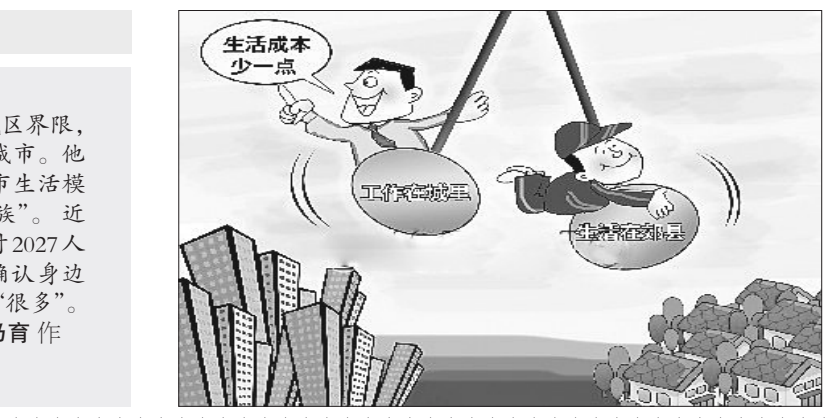
人们自发追悼赵小亭,为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生命的逝去而惋惜,为她高尚的支教行为而感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赵小亭,因为正是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人维系着社会的责任和良知。这样有公民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年轻人,正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也许赵小亭生前并未想到,她的支教会带来什么回报,但人非草木,作为受惠者,贵定县和赵小亭所在的支教学校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又怎能无动于衷?

也许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实在是太卑微,卑微得不足以引起当地官方的重视甚至注意,不足以让当地官员屈尊驾临其追悼会。但赵小亭献出的是一颗心,贵定县政府又何以忍心用冷漠回应?而赵小亭身后,更有无数关注偏远地区孩子上学的人们渴望伸出援助之手,但面对受援者如此的冷酷无情,怎能不叫人寒心?

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贵定县政府的冷漠之举,相信当地百姓也会感到羞耻和难受。希望贵定县政府部门不要再躲躲藏藏,尽快站出来给赵小亭的亲属,给贵定县的百姓,也给所有关心此事的人们一个交代。 晶莹

漫画:钟摆族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突破城区界限,工作在城里,生活在郊区甚至其他城市。他们常常要四处奔波,原有的单一城市生活模式被打碎。这样的人被称为“钟摆族”。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对202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4%的人确认身边存在“钟摆族”,其中23.7%的人表示“很多”。 赵乃育作



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媒体更多监督

业,甚至非常幼稚的行为。

媒体曝出郭德纲别墅涉嫌侵占绿地后,他只是用相声进行“非正式回应”,不但称记者“该打”,而且还污蔑农委是“一帮穷人”。其实,判断是否侵占绿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如果郭德纲懂得相关法律,直接拿出产权证证明就可以了。无论是像郭德纲这样的名人,还是普通的公民,都必须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

现代法律赋予我们有限度侵害名人的权利。美国法律规定“自愿性名人”(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无法主张普通人一样多的隐私权,因为名人从媒体曝光中获得了实质利益,但你不能总想要

“好的”曝光,也必须接受负面曝光。公众人物总是希望正面消息,希望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但媒体是公器,有其独立性和公信力,有监督的权利。所以,公众人物在高兴地接受正面报道的同时,也必须平静面对负面的报道。

作为公众人物,郭德纲忘记了自己的另一项责任:社会影响和示范作用。一个社会要健康存在和发展,必须有主流价值观,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如果郭德纲如此言行,不能在舆论的谴责下真诚悔改并道歉,那以后面对媒体监督时,名人或许会如某些官员一样,用极端手法对付媒体监督。 郭国人

高昂交际费只是高校名利场的缩影

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近日在山东大学所作学术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据他计算: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万-20万人民币,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8月4日中新社)

这么一笔简单的账,本犯不着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来算,只要懂加减乘除具备数学常识的人都能够厘得清、算得明。可是,就是这么一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账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却始终视而不见,以至于需要一名数学家如此痛心疾首地来道破。

教育官员和高校领导都不懂运算吗?当然不是。君不见官场中博士官员扎堆成群,还有那些高校领导也都是教授职称且还要加上知名、著名等诸般头衔。由此可见,这样一笔账不是不会计算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去算、重不重视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投入的问题。而丘成桐教授所指出的,高校宁可花在酒桌饭局上培养感情也不舍得培养人才,加大基础科学投入等现象,高昂的交际费用背后无非是高校异化成名利场之后的一个缩影罢了。

前些天,被称为“三钱之一”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逝世,对于大师的逝去,公众再次发出“大师既往,何以为继”的感叹和担忧。与丘成桐教授算的这笔账相对应,我们可以发现:在光顾着请客吃饭的高校行政化氛围下,原有的人才循环系统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落后的新陈代谢不禁让人担心,在专业学术人才难以为继的现状下,整个社会人才体系会否由匮乏走向崩溃。

而这一切,恐怕跟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脱不了干系。高校行政化的弊病,正污染着学术的阵地,将最后一片净土染上了功利的色彩。为何这个物质条件优越的时代反倒会出现大师难产的现象,恐怕和名利场式的大学氛围有关。因为过多的名利纠葛,只会干扰治学者的心智。而这种追名逐利的风气还在蔓延,更多曾有学术理想的人才被拉下水,以致成为一丘之貉。教授违反学术道德企图捞钱捞权、高校领导贪污腐败……高校和学术功利化以至于沦为名利场,热衷交际只显露了高校诸般弊病的冰山一角。

摒弃行政化,重归学术化,这是人才强国的必由之路。只有加大对人才的培养投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将污染学术领域的乌烟瘴气驱散出去,中国的人才库存才会日益充裕,才能实现人才的正常代谢,形成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切,拿交际的心力去培养科学人才,用交际费的钱财去支持基础科学,算好丘成桐教授所指出的这笔账至关重要。

因此,高昂交际费只是高校名利场的缩影,与更多为公众所诟病的高校乱象一起,亟待一场全面彻底的高校革新。 重行